
基层政府信任的逻辑与建构

——基于华北地区于镇的个案研究

牟永福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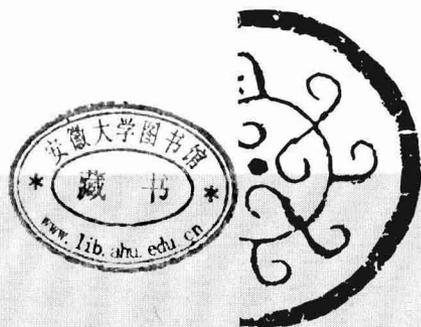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基层政府信任的逻辑与建构

——基于华北地区于镇的个案研究

牟永福 / 著



责任编辑：纪萍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层政府信任的逻辑与建构：基于华北地区于镇的
个案研究 / 牟永福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30-1885-2

I. ①基… II. ①牟… III. ①乡镇-地方政府-行政
管理-研究-杞县 IV. ①D625.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1053 号

基层政府信任的逻辑与建构——基于华北地区于镇的个案研究
JICENGZHENG FUXINREN DE LUOJIYUJIANGOU; JIYU HUABEIDIQUYUZHEN DE GEANYANJIU
牟永福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70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开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289 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经 销：各大网络书店、新华书店及
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7.5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2.00 元

ISBN 978-7-5130-1885-2/D · 1694 (4731)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摘 要

纵观整个政府信任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把政府信任看作一种追求目标，有意或无意地给政府信任设定道德或意识形态的条件，使政府信任从名义上的关系范畴变成实际的实体范畴。对政府信任的静态理解虽然也显示了这种理论工具之于问题的解释力，但是其明显的分析局限却遮掩了我们对政府信任实践形态的全面理解。实践证明，政府信任的运行轨迹不是信任或不信任的两极交错，而是呈现为一条信任与不信任区间的连续曲线：或者处于从完全不信任到完全信任的“增强区间”，或者处于从完全信任到完全不信任的“减弱区间”。

目前，我国一些地方频发的社会冲突使政府信任作为地方治理的社会资本功能受到了严峻挑战，从而影响“善治”目标的实现。有没有一种有效的途径来减缓社会冲突对地方治理的压力，并使之趋于良性发展呢？基于这样的思考，本书以华北地区“于镇”作为调查单位，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镇政府与村（居）民的信任状况进行了翔实扫描，揭示了政府信任的内在运行逻辑、表现方式、收益、影响因子、可能的后果以及制度设计的情形。

全书共包括八章和结语。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意义、主要范畴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架构及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第二章是政府信任的结构，主要揭示了于镇村（居）民与镇政府信任建构的动力、策略和模式。第三章分析了权力与政府信任的关系，通过丰富的实证材料呈现了“街头官僚”、村（居）委会和“草根代表”三种权力主体作为镇政府与村（居）民之间信任“经纪人”的权力角色以及所拥有的信任资源情况，提出了四种权力—信任类型。第四章分别从公众舆论、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四个维度，考察了“街谈巷议”、“流言蜚语”、“面对

面”式接触、“中间人”式接触以及“参与”、“认知”、“情感”、“态度”和“评价”等信任载体。第五章从政府信任的一般假设出发，探讨了普通村（居）民持有的信任资本、行动逻辑，并运用博弈理论建构了村（居）民与镇政府信任效用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模型。第六章讨论了政府信任的客观性影响变量和主观性影响变量，通过问卷和访谈资料剖析了身份或地位、性别与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媒介影响力、社会安全感、流动性以及公共服务质量、角色期待、心理距离和公信力等变量对村（居）民与镇政府信任关系变化的影响。第七章阐述了政府信任的效应问题，指出了政府信任在“增强区间”和“减弱区间”运行中可能出现的不同后果。第八章以制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介绍了于镇政府信任的制度设计形式以及存在的根本缺陷。结语部分主要提出了笔者对政府信任建构的一些看法或建议。

从对于镇政府信任的逻辑与建构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政府信任需要制度的支撑和保护，缺乏制度化的政府信任很容易混淆与人际信任的界限，导致信任秩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信任最容易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达成，但于镇的调查显示，在镇政府与村（居）民的信任建构过程中，前者处于明显的支配性地位，掌握着普通村（居）民难以企及的权力，双方并不具备平等的主体资格。因此，制度设计首先必须保证普通村（居）民享有与镇政府平等对话的主体资格。其次，制度设计还要充分考虑到信任效用问题，把村（居）民对镇政府官员的信任指标量化，作为年终评奖、津贴发放或职位升迁的考核标准，让镇政府官员能够切实感受到信任的损益，增强其与村（居）民建立信任关系的主动性。既然政府信任是一个包含信任和不信任的变化过程，那么，在倡导信任制度化的同时，不信任的制度化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只要把村（居）民对镇政府的不满、反对、怀疑放在制度的框架下，社会冲突很容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政府信任；于镇；增强区间；减弱区间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意义	1
二、主要范畴及国内外研究状况	7
三、研究架构	28
四、研究方法和路径	31
五、创新与不足	35
第二章 政府信任的结构	37
一、信任动力	37
二、信任策略	43
三、信任模式	49
第三章 权力与政府信任	56
一、于镇的权力结构	57
二、政府信任“经纪人”	59
三、信任资源	70
四、权力—信任的类型学分析	74
第四章 政府信任的载体	81
一、公众舆论	81
二、政治沟通	87
三、政治参与	93
四、政治文化	99
第五章 政府信任的效用	107
一、政府信任的假设.....	108

2	基层政府信任的逻辑与建构——基于华北地区于镇的个案研究	
	二、政府信任的资本	110
	三、信任行动的方式	120
	四、政府信任效用的一般模型及其困境	132
第六章	政府信任的影响变量	137
	一、信任测量	137
	二、客观性影响变量	143
	三、主观性影响变量	162
第七章	政府信任的效应	178
	一、“增强区间”政府信任的效应	178
	二、“减弱区间”政府信任的效应	184
第八章	政府信任的制度安排	193
	一、制度与政府信任	193
	二、于镇政府信任的制度形式	198
	三、于镇政府信任的制度设计缺陷	208
	结语	211
附录 1	于镇简介	222
附录 2	“村（居）民与乡镇政府的信任状况”调查问卷（1）	225
附录 3	“村（居）民与镇政府的信任状况”调查问卷（2）	236
附录 4	访谈人物一览表	241
附录 5	关于建立健全于镇信访工作制度和镇领导接待日制度的通知	242
附录 6	于镇 2008 年度包村干部考核办法	244
附录 7	于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制度	249
	参考文献	252
	后记	266

图表目录

图 1.1	政府信任的坐标图示 (一)	24
图 1.2	政府信任的坐标图示 (二)	24
图 1.3	政府信任的“连续谱”	27
表 2.1	熟悉与信任的关系	38
图 2.1	于镇政府信任的结构	50
图 2.2	于镇政府信任的范围	53
图 3.1	乡村社会的一般权力结构	58
图 3.2	于镇的权力关系模式	58
表 3.1	4 种权力—信任类型	74
表 3.2	2007 年于镇派出所出警情况记录	77
表 4.1	自我实现预言的情形：流言蜚语	85
图 4.1	公民参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一般分析模型	94
表 4.2	政治参与类型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性	97
图 4.2	容忍度与信任度相关性的一般分析模型	103
图 5.1	基于信任方向的行动选择	123
图 5.2	抗争代价、控制代价与信任度的关系	131
表 5.1	村(居)民与镇政府的静态信任效用模型	132
表 5.2	村(居)民与镇政府的动态信任效用模型之一	134
表 5.3	村(居)民与镇政府的动态信任效用模型之二	134
图 6.1	信任度与身份或地位的相关性	145
图 6.2	性别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148
图 6.3	政府信任在年龄因子影响下的变化轨迹	149
图 6.4	政府信任在收入因子影响下表现出来的“倒 U”型曲线	151

4 基层政府信任的逻辑与建构——基于华北地区于镇的个案研究

图 6.5	受教育程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152
表 6.1	媒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54
表 6.2	社会安全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156
图 6.6	影响变量的 PDI 值比较	161
图 6.7	政府信任的增强与减弱曲线	162
图 6.8	“距离悖论”的图形描述	173
图 6.9	“心理距离”与“空间距离”的信任相关性比较	174
图 7.1	信任与团结的关系	180
表 7.1	政府信任与政府绩效的相关性	181
表 8.1	2008 年度于镇领导接待日安排表	201
表 8.2	于镇村级服务室服务内容一览表	207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英国的地方治理思想，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冲击、定位着既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渐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引导行政改革潮流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地方治理强调“贴近乎民”，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关系，是当代治理的社会与道德基础。^①如果说传统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依靠的是强有力的垂直控制和命令，那么，地方治理则依靠的是存在于公民中的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政府、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诚如英国公共管理学家罗伯特·罗茨所说，信任构成了“治理”或“善治”的基础，地方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善治目标的实现。^②然而，目前不断频发的社会冲突对地方治理目标的实现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我们不得不加倍审视政府信任特别是基层政府信任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以下是三起典型的冲突案例：

^① 孙柏英：《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② [英] 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木易编译，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案例 1

瓮安，这个地处贵州省北部的小县，以拥有中国最大的磷矿而闻名。2008年6月2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黔北小县瓮安。

当天下午至29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大部分人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台车辆被焚。

祸起女中学生之死。6月21日下午6点多钟，瓮安县第三中学初二年级学生李树芬不慎落水而亡。6月22日上午，经县公安局刑侦队认定，李树芬系自己投水死亡，其家人当场表示不服，提出要进行法医鉴定。6月22日晚8时左右，瓮安县公安局法医对李树芬作了第一次尸检，认定李树芬为溺水死亡。李树芬的家人对尸检结果仍表示怀疑，继续到黔南州有关部门进行反映。6月25日下午，黔南州公安局法医到达瓮安县，对李树芬尸体进行了第二次尸检，再次认定李树芬确系溺水死亡。由于对李树芬的真实死因存在争议，李家将女儿遗体一直停放在事发地点县城西门河大堰桥边。随着前往观看的人群越来越多，各种传言也开始在小县城里广泛流传。

6月28日下午，有300多人用白布写上标语做成横幅后，从停尸地点出发进城游行“喊冤”，沿途不断有人加入，追随围观的人越聚越多。至16时许，县公安局大楼门前及周边已聚集群众上万人。约16时30分，公安局干警组成的人墙被人群冲开，一些人冲进办公楼，在一楼、二楼各间办公室开始打砸和焚烧办公用品。与此同时，一些人开始打砸警车，并焚烧停靠在公安局门口的警车。有些人随后又冲进附近的县政府、县财政局、县委办公楼打砸，多名公安干警被打伤。18时许，附近多辆警车被点燃，现场浓烟滚滚，一片喧嚣，聚集人群多达2万余人。20时至23时，公安局办公楼、县政府办公楼、财政局办公楼、县委办公楼相继被不法分子点燃。

据有关部门统计，事件共造成瓮安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

大楼 104 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 47 间办公室、4 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 14 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另外还烧毁包括 22 辆警车、15 辆摩托车在内的 54 辆车辆，150 余人受伤。（资料来源：新华社，2008 年 7 月 5 日）

案例 2

孟连（全称孟连傣族拉祜族自治县）是云南省思茅市下辖的一个人口不过 11 万人左右的小县。2008 年夏，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却因为一场流血冲突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2008 年 7 月 19 日凌晨 4 时，100 余名警察从孟连县城整装出发，奔赴 40 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执行公务。

然而，晨 8 时许，勐啊村数百名村民呼啸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 58 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岩尚软、岩底父子二人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 150 米外与警察对峙。

这边还在剑拔弩张，两公里外的芒海村又发生了激烈的警民冲突。手持器械的村民一拥而上，攻打执行劝阻任务的警察，数名警察受伤，多辆警车被砸。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 5 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 11 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 700 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

4 基层政府信任的逻辑与建构——基于华北地区于镇的个案研究

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17日）

案例3

感城镇距海南省省会海口市约260公里，是海南著名商品瓜菜生产基地和集散地，小镇上有10多家宾馆、旅社，还有众多娱乐场所，每到瓜菜上市，小镇上外地客商云集，十分热闹。在感城镇，感恩河把宝上村和感城村隔开。宝上村在感恩桥北，感城村在桥南，都是有着上万人口的大村。

2009年3月23日下午，在东方市八所镇某中学就读的感城村籍一名学生与人发生纠纷，被轻微抓伤。该学生立即回村告诉家人，称怀疑是宝上村学生所为，并在家人带领下到感城边防派出所反映问题。期间该学生略感头疼，遂到医院就诊。下午4时许，该学生家长纠集亲朋好友20余人到感城镇政府上访，要求镇政府对此进行处理。感城镇委、镇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接访，镇委书记亲自到医院看望被抓伤的学生，承诺尽快与学校和公安部门协调，追查打人的学生，追究相关责任。但学生家长的亲朋好友一直聚集在镇政府大院，且围观人群越来越多，其中尤以感城村群众居多。

晚7时半许，聚集人群达数百人，其中有人开始对镇政府办公大楼进行打砸并纵火，导致政府办公楼4间办公室过火，1辆公务用车及部分文件资料被烧，事态在一瞬间迅速升级。随后，这些人又冲到镇政府大院对面的感城边防派出所，对该所进行打、砸、烧，导致4间官兵宿舍及部分档案资料被烧，1辆警车、1辆涉案扣押的小汽车及10部摩托车被砸烂烧毁。随后情绪比较激动的人群迅速向感恩河桥头聚集，对宝珠楼部分客房及设备进行打砸烧。整个事件共有3处着火点，14间办公室、宿舍或客房过火，3辆汽车及10部摩托车被砸烂烧毁，电视机、电脑、办公桌椅等部分设备被砸，部分档案资料被烧。据初步估计，财物损失在100多万元。

25日再度延续。在该镇宝上村，村民用水泥电线杆拦住一辆从

村前公路上路过的运载水泥的货车，并当场把司机砍成重伤，砸烂汽车，伤者送医院不治死亡。25日下午13时30分，感城村数百村民冲入宝上村地界与宝上村数百村民发生械斗，由此更加加剧了紧张气氛。全副武装的武警和公安有关人员已经驻守宝上村桥两头，以防当地群众过激行为再度发生。夜里，村民则家家关门闭户，村内如空无一人。（资料来源：人民网，2009年3月26日）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和“海南3.23事件”。也许这是三起孤立的、互不相干的事件。然而，如果我们结合下面两组调查数据，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事件其实揭示了一个当下非常值得关注和迫切研究的问题：基层政府信任。

调查数据 1

2005—2006年，《小康》杂志与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以及专家联合组成“中国小康指数”调查组，采取非概率抽样的研究方法，对政府官员、舆论媒体、专家学者、民间意见领袖4个群体进行了信任测评。结果发现，61%的民众对专家学者表示信任，48%的民众显示出对民间意见领袖和媒体的信任，表示信任政府官员的民众仅占35%。2007—2008年，该杂志又会同新浪网及相关专家对政府的总体信任度进行了调查，40.7%的受访者回答“不太信任”，25.4%的人回答“非常不信任”，28.2%的人认为“一般”，仅有5.7%的人回答“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但是，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地方政府。（资料来源：中国网，2006年9月30日）

调查数据 2

2006年4—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中的130个区（市、县）、260个乡镇（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抽取7063个居民户，然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居民户中按规则随机

选取 1 人作为被访者，由调查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了访问。调查显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官和警察、社区组织、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信访机构、宗教组织等 8 种社会基本权力选项中，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资料来源：《新快报》，2007 年 5 月 23 日）

从两组调查数据看，目前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基本上集中在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而三起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恰恰都与基层政府有关。也许我们可以为事件的发生找出多个理由：也许是基层政府行政处置方式的不当，抑或如官方所言的缘于农村个别黑恶势力的推波助澜。但是，笔者却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长期以来，笔者对信任问题关注比较多，对于信任或不信任的发生机制应该说比较了解。以三起事件为例：“瓮安事件”起因于一名女中学生的落水而亡，当地公安机关接连进行了三次尸检，结论都是溺水死亡，事情本来可以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死者家属对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不相信，硬要讨要个说法，从而酿成了惨剧。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死者家属信任当地公安机关，事件就不会发生；如果当地群众相信基层政府，各种传言就不会出现；如果各种传言不会出现，当地群众就不会受到误导，聚众闹事；而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相信群众的话，也就不会出动大批警察，与当地群众发生对峙……如此多的“如果”无非体现了一个问题：当地群众与基层政府没有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关系。“孟连事件”起因于胶农与橡胶公司的纠纷，本可以通过多种非行政的方式予以解决。然而，就是这样一件普通的劳资纠纷，最终却演变为一场严重的警民冲突。从事态发生的经过来看，当地政府动用大量警力，实际上否定了可以通过协商或者法律解决劳资纠纷的途径；而当地群众认为基层政府介入以后，不能够主持公正，不能够维护民众的利益，不得不与之聚众对抗。这又是一个双方的信任问题。“海南 3.23 事件”也起因于一个不大的事件，只是感城镇宝上村和感城村两个学生发生纠纷，结果又酿成一起基层政府与当地群众的严重冲突事件。其实，纠纷发生后，镇政府的处理还是非常及时和有效的，但是为什么当地群众还是不满意并围攻镇政府呢？说到底，恐怕还是村民与当地

政府长期信任积恶的结果。

这两组调查数据和三起事件虽说并不是本书写作的全部理由，但是，它至少是激发笔者确定写作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一个管理学博士研究生，职业的敏感让笔者不得不苦苦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本不是政府引起的小摩擦，为什么会最终转向对政府的暴力冲突呢？而这种暴力冲突为什么更容易发生在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而不是高级别政府与民众之间呢？上述两组调查数据和三起事件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在追求技术化、科学化的行政手段时，政府信任是不是也应该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因此，揭示基层政府与当地群众之间的信任逻辑，建构起有效避免发生严重冲突的良性信任机制，就不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更具有实践上的意义。

二、主要范畴及国内外研究状况

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说其古老，是因为关于政府信任的思想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说其新颖，是因为作为一个明确的学术概念，政府信任研究的兴起不过才几十年的时间，而在我国要更晚一些。政府信任理论涉及两个重要范畴：一个是信任；另一个是政府信任。

范畴 1：信任

信任是政府信任的概念基石，研究政府信任离不开对信任理论的回顾。能否全面有效地对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做出解释，是任何学术探讨需要首先予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信任的说明决定了读者是否能够获得一个明确而坚实的问题指向。“信任”（trust），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货币哲学》。在齐美尔之后，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在本学科体系内做出了各自的信任诠释。

信任体现了一种人格特质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心理学家多伊奇（M. Deutsch）就对信任进行了心理学研究。^①他在著名的囚徒困境实验中从探讨如何解决冲突入手，发现人际信任的有无可以通过双方合作与否反映出来，人际信任是一个被看作由外界刺激决定的因变量，从而开创了社会心理学研究信任的先河。

在多伊奇之后，心理学家霍斯莫尔循着人际信任研究的思路，从个体差异、人格特点的角度，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借助测量、统计、比较的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霍斯莫尔归纳了信任定义的 5 种角度，即个体期望角度、人际关系角度、经济交换角度、社会结构角度以及伦理角度；^②罗特尔（Rotter）认为，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即信任是对他人言行方面可靠性的信任；^③怀特曼（Wrightsmen）认为信任是存在于个人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一种经过社会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④显然，他们对于信任的看法已从“外在”转向“内在”，即不像多伊奇那样，认为信任是外在情景刺激的结果，而是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可见，在心理学家的眼中，信任是一种存在于个人内部的相对稳定的性格特质，或者如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所说，信任是人的一种品性，“是命令不来的，它源自我们心灵深处”。^⑤

信任预示着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期望

1988 年，美国学者伯纳德·巴伯在考察了信任在家庭、基金会、政

① Deutsch, M. , 1958. Trust and Suspic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 pp. 265—279.

② Hosmer, L. T.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0. 1995 (2): 381.

③ Rotter, J. B. , 1967, “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5: pp. 651—665.

④ Wrightsmen, L. S. , 1964, “Measrement of Philosophies of Human Natur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4: pp. 743—751.

⑤ [法]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邱海婴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551 页。